

海外学术  
西域考古图记

# 西域考古图记

原著/[英]奥雷尔·斯坦因  
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Westwardmost China*

第一卷



海外遗珍  
国外西域考古 经典论著译丛



# 西域考古图记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Westernmost China*

## 第一卷

原著/[英]奥雷尔·斯坦因  
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



海外遗珍——国外西域考古经典论著译丛  
西域考古图记

[英]奥雷尔·斯坦因 著

巫新华、刘文锁、秦立彦、肖小勇、谢仲礼、姜波、赵燕、新华 翻译  
张良仁、龚国强、赵静、王宗磊、丁素琴、胡锦涛、徐华

孟凡人 主审

责任编辑：宾长初 郑纳新 陶征 龙子仲  
唐长兴 刘文俊 朱寿兴

装帧设计：吕敬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36号)

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89×1194 1/8 印张：253.25 插页：236 字数 2938 千字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200套

ISBN7-5633-2173-X/K·066

定价(全套)：5500.00元

### 学术指导委员会

主任  
季羨林

副主任  
张文彬 孟凡人

委员  
张显清 刘庆柱 何林夏 王 巍 杨 泓 安家瑶

### 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

总策划  
孟祥林

主任  
肖启明 孟祥林

副主任  
何林夏 巫新华

委员  
宾长初(常务) 谢建猷 龙子仲 郑纳新  
陶 征 肖向阳 沈 明 姜革文

翻译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翻 译  
巫新华 刘文锁 秦立彦 肖小勇 谢仲礼 姜 波 赵 燕 新 华  
张良仁 龚国强 赵 静 王宗磊 丁素琴 胡锦涛 徐 华

主 审  
孟凡人

责任编辑  
宾长初 郑纳新 陶 征 龙子仲 唐长兴 刘文俊 朱寿兴

校 对  
肖向阳 刘哲双 王其坤 陈红妮 杨小雪 梁小勤 蒋咏梅 黄 斌 王德玫 马文玉  
张今强 阳 梅 陆良慧 莫庆兰 黄 辛 梁燕鸿 伍 兵 罗文波 沈伟东

装帧设计  
吕敬人



## 翻译分工

- |     |  |
|-----|--|
| 刘文锁 | 导言<br>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                       |
| 肖小勇 | 六章、八章、九章、十章、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一至七节及九节             |
| 胡锦涛 | 七章   |
| 巫新华 | 十三章八节、二十六章、二十七章<br>附录 A、附录 D、附录 E<br>第五卷地图 |
| 赵 燕 | 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                                |
| 谢仲礼 | 十七章、十八章                                    |
| 秦立彦 | 十九章、二十三章、二十四章、二十五章<br>第四卷图版目录及图题           |
| 姜 波 | 二十章、二十一章、二十二章                              |
| 新 华 | 二十八章、二十九章、三十章                              |
| 龚国强 | 二十九章部分遗物                                   |
| 张良仁 | 三十一章                                       |
| 赵 静 | 三十二章、三十三章                                  |
| 王宗磊 | 附录 G、附录 I、附录 K、附录 F 一部分<br>附图图题            |
| 丁素琴 | 附录 F 一部分                                   |
| 徐 华 | 附录 B、附录 C、附录 H                             |

## 前 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五卷汉译本终于与大家见面了,这是我国学术界值得欣慰的一件大事。《西域考古图记》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的《海外遗珍——国外西域考古经典论著译丛》(丛书包括英、德、法、俄、日等国考察队 20 世纪初以来,考察并劫掠我国新疆、甘肃等地珍贵文物后所出版的重要报告和专著)中的第一部。该书和将要出版的本丛书其他著作,对我国考古学范畴的新疆考古学、河西地区考古学、佛教考古学、建筑考古学、古民族文字学、简牍文书学、铭刻学、钱币学和体质人类学等方面,历史学范畴的新疆古代史、河西地区古代史、古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等方面,民族学范畴的新疆古代民族史和古代民族文化史等方面,宗教学范畴的佛教、摩尼教、景教和袄教等方面,艺术史范畴的雕塑、绘画、音乐和舞蹈等方面,以及地理学、敦煌吐鲁番学、古代社会学、丝绸之路史、东西方经济文化艺术交流史、古代国际关系史、古代服饰史和有关农业、手工业、商业与军事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工作,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域考古图记》一书,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 1906—1908 年在我国新疆和甘肃西部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全部成果的详细报告,也是斯坦因 1900—1901 年第一次新疆考古调查和发掘后所出《古代和田》报告的续编。《西域考古图记》一书涉及的地域十分广阔,从西向东包括了今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和河西走廊一带。在这些地区调查和发掘的重要遗址有阿克铁热克、喀达里克、麻扎塔格、尼雅、安迪尔等遗址,米兰佛寺遗址和吐蕃城堡遗址,楼兰古城及其附近遗址,焉耆明屋及其附近的石窟寺和遗址,甘肃西部汉长城和烽燧遗址,敦煌千佛洞和藏经洞等。斯坦因在这些遗址所发现遗物的主要类别有雕塑,绘画,简牍文书(包括汉文、梵文、佉卢文、和田文、龟兹文、吐蕃文、突厥文、粟特文和回鹘文等),织物(丝、毛、麻、棉等),钱币,碑刻,佛经残卷,以及大量的陶、木、石、金属(金、银、铜、铁等)、玻璃、料器等质料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装饰品和兵器等。书中还配有大量遗迹插图,遗址平、剖面图,还有一卷遗物图版和一卷调查地区的地图。全书以考古学为核心,并基本上涵盖了前述诸学术领域,内容十分丰富。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一书有许多突出的特点,比如:1. 资料性强,可利用率较高。斯坦因对所调查和发掘的遗址,均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对遗迹和遗物作了详细记录,并进行综合分析,整理后刊于本书中,比较系统和准确,便于利用。2. 地理学与考古学结合。这是斯坦因考古研究很突出的特点。他除对某些地区进行单独的地理学考察外,还对所到遗址的地貌、河流、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变迁及其与遗址的兴废关系进行考察。经他分析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或看法,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3. 涉及的领域广、学科多、信息量大。除考古学外,凡与遗迹和遗物有关的学术领域和学科都程度不等地涉及到了,并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此外,他还将所发掘的遗迹、遗物与中亚、犍陀罗和印度、西亚乃至西方的资料进行对比研究,引用了很多西方的研究成果;对遗迹、遗物的渊源关系,遗物的生产技术与制造工艺也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信息量很大。这些成果和信息有利于中国学者开阔眼界,了解西方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相关领域研究的历史和发展状况,在批判地吸收其成果的基础上,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4. 浓缩了斯坦因三次考察相关部分的主要成果。书中凡涉及他第一、三次考察的相关部分,多相互进行比较和印证,并对考察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因而浓缩了他三次考察的主要成果。5. 集众家之长,研究水平高。本书不仅在资料整理方面集中了众多专业技术人员和高水平的专家,在研究方面更是名家荟萃。因此,《西域考古图记》一书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代表了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在这一领域中的最高研究水平。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一书,学术价值很高,影响深远。该书所刊布的资料至今仍是各有关领域的基础资料,有的甚至是唯一的资料。今新疆地区(也包括河西走廊)由于是古代东西交通的大动脉,又是丝绸之路的中枢地段,因此成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艺术和多种宗教的交汇融合之地,从而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灿烂的物质文化。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一书中,对这种研究难度很大的物质文化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指出了这种物质文化在古代人类文明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其研究成果的影响至今犹存。有关这方面的问题,限于篇幅,兹不详述,请读者参阅原著。下面仅从资料的角度略举几例,简要说明其重要的学术价值。1. 斯坦因发掘的尼雅遗址,是新疆已知的遗址中面积最大、保存状况最好、整装性最强的遗址。它为研究古代精绝国和鄯善国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最重要的实物资料。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发现的众多实物资料极具研究价值,特别是大量佉卢文简牍乃世所罕见,东汉魏晋汉文简牍也弥足珍贵(包括第一次考察时的发现)。这些简牍和其他实物资料,对复原公元 3—4 世纪尼雅遗址与鄯善的历史和文化、社会构成和社会生活状况、生产关系和经济状况(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对研究鄯善的佛教与佛教艺术、遗物的生产技术和制造工艺,对研究东汉魏晋时期鄯善和西域南道诸国与中原王朝和贵霜的关系以及佉卢文字的演变和



传播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现在已重新进行尼雅遗址的考古工作,但斯坦因的资料仍是不可替代的。2. 米兰佛寺遗址和吐蕃城堡遗址。米兰佛寺遗址群是研究鄯善佛教与佛教艺术最重要的资料,其塑像、壁画和佛塔遗址在新疆独具特色,并与犍陀罗佛教艺术有密切关系。犍陀罗佛教艺术只发现雕塑,故米兰佛教壁画便成为研究犍陀罗风格佛教绘画仅有的依据,在学术界和艺术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米兰佛寺遗址经斯坦因发掘后已遭破坏,所以斯坦因刊布的资料是无法替代的。斯坦因在米兰吐蕃城堡遗址发掘出大量的吐蕃文简牍等遗物,还有他在麻扎塔格遗址所发现的吐蕃文简牍和其他遗物,都是研究公元8—9世纪吐蕃在今新疆地区活动情况,吐蕃建筑特点和艺术风格,吐蕃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吐蕃社会状况,职官和军事组织情况,吐蕃文字以及吐蕃与唐朝、西域及周边地区关系的极为难得的重要资料。3. 楼兰遗址,是斯文·赫定首先发现的,但大量的调查和发掘工作是由斯坦因进行的。斯坦因所刊布的楼兰遗址(包括其附近地区)的遗迹、遗物,大量的魏晋前凉时期的汉文简牍文书,以及部分佉卢文简牍文书具有重要意义。据此可基本复原出魏晋前凉时期西域长史机构的职官系统、屯田概况、社会生活状况、西域长史机构与鄯善及西域诸国的关系。这些遗迹、遗物对研究楼兰古城的性质和鄯善国都的方位以及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等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他所发现的汉文简牍文书不仅可以补史籍之不足,还可弥补中国简牍史中的缺环,并为木简向纸文书的过渡提供了实证。斯坦因刊布的这些资料,目前仍是最全面、最具权威性的,影响很大。现在国内外学术研究中的楼兰热与此亦有很大关系。4. 汉长城和烽燧遗址。斯坦因对河西走廊张掖以西的汉代长城和烽燧遗址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调查,并对汉代长城的位置、走向、构筑技法,烽燧的分布态势、结构和功能,长城、烽燧附近的地貌、山川形势及其与长城烽燧遗址的关系,长城、烽燧修筑的年代及其与两汉盛衰和西域形势变化的关系,汉长城和烽燧在历史上的作用等问题均作了具体分析。同时他还首次确定了汉玉门关和阳关的位置,发现了许多汉代遗物、汉文简牍和少量粟特文资料。书中所收汉长城和烽燧的资料丰富翔实。迄今为止,国内外所刊布的这个地区汉长城和烽燧的资料,总的来看,尚未有出其右者。此外,斯坦因还劫掠了敦煌藏经洞的文化宝藏(这是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这批珍贵文物无与伦比的学术价值是众所周知的,兹不赘述。总之,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中收录的资料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在此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及所构筑的基本学术框架,对前述的新疆考古学和敦煌学等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一书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这主要是受当时学术研究总体水平的制约,并与他个人学识的局限性和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政治思想对他有较强烈的影响密切相关。所以对本书的不足之处,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予以审视和评论。

除上所述,应当指出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一书所收的遗迹、遗物等全部实物资料,都是通过对新疆和甘肃西部重要遗址的破坏和劫掠而获取的。他在遗址中剥取壁画,搬走塑像,凡能拿走的文物均席卷一空。对此,斯坦因在书中亦直言不讳,因而给那段令国人屈辱而心碎的历史留下了真实的记录。这些被斯坦因和西方其他列强的学者、探险家们所劫掠的中国古代文物精粹,在国际学术界造成了巨大的轰动,从而引发了当时欧洲和日本东方学研究的大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学术界也因此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开始觉醒,奋起抗争,并积极投身到对这批文物的研究当中去。此后,国内外一批新学科陆续建立,一批大学者相继出现,填补了许多学术领域研究的空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凡此都是中国古代珍贵文物本身的价值所致,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瑰宝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这个结果是帝国主义列强所始料不及的,也是与他们的本意相违的。因此,必须将上述情况与他们应受到严正谴责的劫掠行径严格区分开来。

如前所述,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古代文化遗产遭受西方列强空前的浩劫。所有遭到这场浩劫的遗址均被破坏了,珍贵的遗物也没有了,所以斯坦因等人刊布的这些劫掠遗迹、遗物的报告和专著,就成为研究与此相关的各学科仅存的基础资料。但是,由于这些书出版早,价格昂贵,我国当时就很少见,现在更加难寻,因此,很多学者对这些书的详细内容不甚了解。这种状况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相关学科研究的发展。故几十年来,几代学者都有将这些书译成汉文出版的强烈愿望,然而限于主客观条件一直未能实现。最近一些年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学术研究的需要和新疆的具体情况,迫切要求我们必须将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新疆考古学、新疆古代史、新疆古代民族史和宗教史的研究搞上去。这既是艰巨的学术任务,又是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政治任务,但上述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的匮乏却成为梗阻有关领域深入研究的主要障碍之一。为扭转这种极为不利的被动局面,学术界对翻译出版这些著作充满着殷切的期望。在这种情况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高瞻远瞩的胆识,为弘扬祖国古代文化,促进学术繁荣,加强民族团结,毅然肩负重担,决定投巨资出版列强劫掠中国古代珍贵文物后所发表的主要著作,并立即着手,以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一书为起点,与我携手,迅速组织力量进行翻译和编辑工作。这是对我国学术研究和加强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要贡献,对此我们深表敬意。现在,《西域考古图记》一书已经顺利出版。这是翻译本书的学者们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全体同仁团结奋斗的成果,同时也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广西师范大学领导的支持与关怀密不可分的,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西域考古图记》一书已经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了,以后其他有关重要著作的汉译本将陆续奉献给读者。我们相信这些著作汉译本的出版,一定会促进我国与此相关诸学科研究的发展,并必将会取得更多更好更大的科研成果和重要而良好的社会效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998年10月



## 出版说明

本书根据克拉伦登出版社 1921 年版翻译。

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图记》涉及古今多种语言文字以及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美术、建筑等多种学科,是一部语言现象复杂、学科门类繁多的综合性学术专著。我们在组织翻译和编辑过程中,为解决所遇到的语言和技术上的问题,拟订了一些原则,特在此略作说明。

一、本书原名《西域(Serindia)——中亚及中国西部地区探察之详尽报告》,作者无理地将我国新疆地区视为中亚而划出我国疆界之外,所谓“中国西部地区”则专指我国甘肃省地区,对此,我们一概不予承认,故此书翻译出版,定名为《西域考古图记》。

二、为保持原书的原貌,译文力求忠实于原文。由于时代的局限、文化的差异以及其他原因,斯坦因的原书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由于历史的原因,斯坦因原书中的学术观点,有些不很正确;原书中的某些专业术语,表述上也不够规范。再者由于文化的差异,斯坦因原书中存在着一些知识性错误,如他把“开元通宝”误认为是唐高祖时期发行的钱币。尤其是斯坦因的探险考察还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和文化掠夺的性质,因此,他的一些观点具有自我辩护的成分。对这些不足之处,我们在前言中予以总的说明,在正文中则不作具体分析。因此,读者在征引该书观点时要妥加甄别。对原书的专业术语,我们一律保留原貌,但为方便读者阅读,我们在个别容易引起歧义的地方于原表述词后加注说明,阐明译者的意见。

三、确保中文资料的准确性。斯坦因从他人译作中转引了《史记》、《汉书》、《唐书》、《大唐西域记》、《魏略》等我国古代文献。这些文献经过多次转译,必然出现偏差和失误。为了确保引文的准确性,我们不根据原文转译,而是对照我国古代文献资料直接抄录。原书附录 A 和附录 E 中引用了一些汉文简牍和文献,考虑到这些资料均已有正式出版的同类书籍,故只存其目,或摘要翻译部分内容,并加上译者说明。

四、专有名词(包括人名、地名、著作名称等),均按通行译法翻译。一些译名虽不甚准确,但因学术界已约定俗成,故一仍其旧,不再另译。为便于读者准确把握原意,个别冷僻专有名词未作汉译;一些中亚古代文字写卷中的人名、地名,因目前尚无约定俗成的译名,故亦未作汉译。

五、保留原书的计量单位、文物编号及遗物排序等,以便于使用和检索。原书大量使用的计量单位(如里、英里、英尺、英寸、码等),均不换算成现行的法定计量单位;原书中的文物编号、遗址编号,均保留原貌;原书中的附录排序和遗物排序,均有不连续的现象,如原书附录的排序为 A、B、C、D、E、F、G、H、I、K,没有附录 J。这些,我们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均未作调整。

六、人名、地名及其他方面的专有名词,首次出现时,于汉译名后附注原文,以后出现不再加注。

七、为便于读者查找和对照,我们对“著作名称缩略表”作了汉译,并附上原文。

八、原书注释及正文中征引了大量的文献,凡“著作名称缩略表”中已列有者,均用缩略语表示,凡“见上文(下文)某页”者,一律改为“见上文(下文)某章某节”;原书注释以节为单位排序,译本以页为单位排序。

九、地图翻译的说明。本书地图所用地名多为 20 世纪初地名,许多地名俱是当地口语的音写,与现今地名出入较大。为保持原图资料的完整性,我们在保留原图音写地名的基础上,着重译出重要的山川、河流、戈壁、沙漠、绿洲、村庄等名称和各类遗址、遗迹名称,对那些无视我国主权的地理命名,我们一律不予承认,并据有关资料对其作了修正。本书地图的翻译以国家测绘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测绘局、甘肃省测绘局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名委员会的相关地图、地名资料为主要依据。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11 月





## 导言

在 1906—1908 年间,我受印度政府派遣,前往亚洲腹部地区开展我的第二次中亚探险。此次探险主要是考古性质的,但在很大部分又是地理学的。本书的目的,即在于为这些考察活动提供一个完整的记录。这些探险活动的计划,是直接根据我 1900—1901 年对中国新疆地区所作第一次考察的结果而做的,其开始制定正好与我的关于那次先锋性探险的详细报告《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一书的完成相衔接。

这次新的探险意欲覆盖一个更为宽广的地域,自兴都库什山谷地及阿姆河(Oxus,即新旧《唐书》乌浒水——译者)极上游地区,跨越整个塔里木盆地,直到中国西部省份甘肃。推动我此次新努力的目的是相同的,由于以各种各样的考古学发现、新调查和观察的方式所获得的结果如此广泛地验证了这些目的,以至于要求做这些卷帙浩繁的著作来记录下它们,因此我觉得在这里只须对我的探险事业的总目的作一个最简短的介绍,也许就足够了。

人们总怀着一种热望,从那些长久以来废弃在大沙漠中的废墟里,寻找到更多的遗迹,以复原那个古老的文明。而这朵文明之花曾经盛开在遥远的中亚通道的绿洲沃土之上,荟萃了佛教印度、中国及希腊化近东诸文化之影响。只有在当地的调查,才能详尽地廓清这条曾目睹了印度、西亚及远东诸文明间之文化交流的古老道路的历史状况。这条路就是丝绸之路,这条道路凭借着贸易和宗教使节以及中华帝国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对中亚的不断的扩展,虽面临着无比严峻的自然地理障碍仍维持了诸多个世纪。我一直渴望着有不管什么样的机会,能让我亲到沙漠和山地中那原先未曾涉足过的地方去考察。这样必有助于阐明在那些沙漠遗址中直接发挥作用的地理学因素,而这些遗址中曾保存的大量的古物,一般来讲还是中亚物质条件和经济史的承载者。

◁探险的目的

看起来命运正在垂顾我,使我得以完整地且又有大量有研究价值之结果地实践我的计划。对此,本书的研究者可以放心地去形成他自己的判断。欲知个中艰辛与努力,读者可从我的个人旅行记《沙漠契丹》(*Desert Cathay*)一书中寻找到那些故事。<sup>①</sup>但是,在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探险的范围,我花费了两年半多的时间在旅途中和田野工作中,而我步行或骑马走过的路程合起来则达到 1 万余英里。如此的范围已足以使我有理由选择本书这么一个书名了。

◁探险的范围

只要看一眼我们的考察路线总图,就可看出我们的工作实际上涵盖了西自帕米尔(Pamirs)东至太平洋分水岭之间的全部干旱地区。该地区在一千多年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中印文明交汇地——在中国方面,是由于贸易和政治渗透之向西发展所致;在印度则是由于佛教传播的结果。关于塞林底亚(Serindia 一词所指的地域范围,实则相当于中国古代文献中所说的“西域”,故本书书名意译作《西域考古图记》——译者)一词,其法文形式是 *Sérinde*,最初是由法国学者提出的,它绝妙地被用来命名这个地区,无论在自然方面抑或历史联系方面,都非常准确。这个词是由普罗柯庇俄斯(Procopius)自希腊文的  $\Sigma\eta\rho\epsilon\sigma$  和  $\text{I}\nu\delta\alpha$ <sup>②</sup> 组合后译成的当地名称,虽然没有更多的所谓的“有学问的大众语源学”基础,然简洁而富有意义,极有用处。

◁采用“塞林底亚”(Serindia)作书名

我的新旅行计划早在 1904 年即已形成,当时我正羁身于印度西北边省及俾路支斯坦教育与考古测量局监察长一职的繁重公务之中,一边偷闲挤出时间来完成我的《古代和田》一书的写作工作。受亡友——我的老上司——上校哈罗德·狄恩爵士(Colonel Sir Harold Deane,他是印度西北纵队的首长)的个人兴趣的善意鼓励,那年秋天我向印度总督呈交了我的详细建议,并受到了总督喀赞勋爵(Lord Curzon as Viceroy)的支持。喀赞勋爵是一个著名的人物,以热衷于地理学研究和大力支持印度的文物和历史工作而著称,他个人这方面的兴趣对他接受我的计划是一个最大帮助,我本人对此永存感激。我还得到了一些友善的地主和朋友们的支持,他们是已故的邓芝·伊贝森爵士(Sir Denzil Ibbetson)和麦克雷根先生(Mr. Maclagan,现在已是爱德华爵士 Sir Edward),后者后来做了印度政府税收部秘书,目前任旁遮普邦(Punjab)的副长官,他们为我的建议的顺利实施扫清了道路。

◁探险被印度政府批准

印度政府方面的最后批准,由于有了国务大臣阁下的批示而变得容易起来了。大英博物馆的委托人接受了印方的建议,同意提供由我估算的总计 36 000 卢比(合 2 400 英镑)<sup>③</sup> 考察经费的五分之二,将来按此份额来分文物。大英博物馆对我这一次和第一次探险提供了合作及各种各样的有价值的帮助,这是一个尤其令人感到高兴的想法:我成功地带回来的古物,大量的搜集品,包括数百件极富艺术价值的绘画和数以千计的写卷等,此种“考古学收益”,即使从财务角度来考虑,也是一种很有益处的投资。

◁大英博物馆委托人的合作

在 1905 年春天我的申请获得最后批准之后,有一件与此有关的官方事务影响着我,加上正在完成的《古代和田》一书的编写工

◁延迟出发

① 《沙漠契丹》,奥雷尔·斯坦因著。两卷本,有大量插图及彩版、风景照及第一手测绘之地图。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伦敦,1912。

② 参见普罗柯庇俄斯《利布里的雏菊》(*Libri de bellis*), (奥利[Haury]编) VIII. 17. 7; 尤尔、科尔迪耶《契丹》(*Cathay*), 第一卷, 24 页, 204 页; 寇爱德(Coedes)《希腊与拉丁文献》(*Textes grecs et latins*), xxix 页, 127 页。

③ 鉴于费用的增加——这是由未曾意料到的大量搜集品之运输以及自我第一次探险以来中国新疆方面物价的普遍上涨所引起的——这一经费预算不得不在 1908 年从印度政府国库中追加了 12 000 卢比。



作,使这些计划的实施多滞留了一年时间。但是由于做了一些努力以及政府方面的慷慨特许,使我从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在克什米尔度过了六个月的自由时间。我很满足那里的条件,在北方边界以外,我着手开始我的工作,这一直持续到了1906年的4月。我对那段时间的工作是满意的。

印度测量局之助▷

对那些工作——它们都是地理学方面的——来讲,从一开始我就受到了印度测量局的大力资助,他们为我提供了一笔最有价值的资产。F.B.朗格上校(Colonel F.B.Longe,后来的印度调查长)已答应派一个受过训练的印度测量员随同我一起考察,他并且答应提供一笔特别的费用,用于其下属以及我们的地形测量工作的花费。布拉德上校(Colonel Burrard,他现在已是悉尼爵士[Sir Sidney])最初是三角测量处的主管,后来也做了调查长,对我的探险表示了最友善的兴趣,并利用每一个机会,根据他自己的经验,鼓励和引导我们的田野工作。他极大地简化了三角测量处的制图记录方面的准备工作,这些现已都在包含有94幅图的地图集中作了介绍,这些图组成了本书的第五卷。

反映测绘情况的▷  
地图集

在我的《中国新疆及甘肃考察图注》(*Notes on Maps Illustrating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and Kansu*)中,曾详细介绍了我们使用的测量方法,包括规则的平板测量之外的三角测量和天文观测,它们都由我的制图助手或我们两人中的单独一人来完成。可惜那些介绍1911年在皇家地理学会的《杂志》(*Journal*)上发表时<sup>①</sup>,被大量地删减了。在我一般性的直接监督下,对于当地名称等的翻译采用了音译法,该方法也同样用在了地图集的最后编辑之中。<sup>②</sup>征得皇家地理学会同意,在那些被减少发表的地图中,有一幅表示这次考察全部区域的总图,其比例是1:3 000 000,被用作地图集的索引图。这幅图还附带着可以用作一幅适用的插图,用以表示我的助手们曾做过制图工作的地方。此外该图还可以用作参考,作为一种附加的“路线”用在那些特殊地区的章节中,以介绍地理方面之信息。由此,它还可作为那些地理学的学者们,在使用我的著作时提供便利。

测绘工作的助手▷

我在制图方面获得的成功,最大程度上得益于拉伊·拉姆·辛格(Rai Rām Singh),他现在是印度测量局的局长助理。在测量方面他具备有久经考验的能力,熟悉中亚的山地和沙漠。当1906—1907年我们的冬季考察活动的艰辛条件影响到其健康状况使他被迫返回印度时,悉尼爵士布拉德特意安排了一个叫拉伊·巴哈杜尔·拉尔·辛格(Rai Bahādur Rāl Singh)的测量员顶替他。拉尔·辛格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我还从未见过第二个像他那样的对艰辛工作具有如此热情的人。在众多的实际工作中,这两人总是我最可依赖的助手。让我感到无限高兴的是,当我自此次探险返回后,皇家地理学会在奖励我“奠基者金牌”之时,尚未忘记给我这两个优秀的助手以应得的奖励。

来自坑道工兵的▷  
“手艺人”

还有一小部分工作是由奈克·拉姆·辛格(Naik Rām Singh)完成的,他原是乔治王(King George)所属的坑道工兵部队的一名军士,好心的J.E.狄奇上校(J.E.Dickie,现在是少将,他后来做了西北边省皇家陆军工兵部队的司令)将他从那个著名的部队中抽调了出来,作我的“手艺人”。他还负责冲印我这次考察带回来的大部分照片,这些照片全部由我拍摄,有一部分选出来作这些书的插图。但是到考察快结束时,一件悲惨的事发生在这个能干而又诚实的助手身上了。关于此事读者可详见本书第三十三章,在那里我有详细的记载。<sup>③</sup>

考察结果概括▷

考虑到这些书卷已经很浩繁,我在此须得克制自己,以避免对我这次探险的诸考察结果冒昧作任何的概括,也许不这样做也仍能说明其中那些专家合作者们曾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他们对我的各种重要帮助。但要将我现在的工作作一合理的概括,也许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所走过的路线——自印度—阿富汗边境直到阿姆河极上游地带(第一、二章)——给了我机会,让我得以研究到大量的历史学和人类学问题,像斯瓦特(Swat)、迪尔(Dir)、吉德拉尔(Chitral)和马斯图吉(Mastuj)等地,尤其是那一次值得纪念的中国远征军穿越帕米尔和兴都库什山(Hindukush)的路线(公元747年)。由于阿富汗斯坦(Afghanistan)已故国王哈比布·乌拉(H.M. Habib-ullah)陛下的特别准许,使我得以穿越瓦罕(Wakhan)谷地的极上游地区和帕米尔高原的阿富汗领土。我在该地以及随后从萨里库勒(Sarikol)到喀什噶尔(Kashgar,即今喀什——译者)沿途所做的观察(第三章第一至三节),为探索早期人类穿越“世界屋脊”的路线,提供了特别的证据。

乔治爵士麦喀特▷  
尼先生之助

在喀什噶尔稍做停留期间,在驻新疆总领事麦喀特尼先生(Macartney,汉语名字为马继业,现在已是乔治爵士 Sir George)的殷勤照应下,我得以和这个很有助益的老朋友重叙旧谊,他对统治着这个广大地区的中国官方有着巨大的影响,这对我的探险的成功是一个巨大的帮助。他对我的无穷尽的关照使我终生难忘,而我欠他的感谢则太多。同样重要的是,他还为我挑选了一个叫蒋师爷(蒋孝琬)<sup>④</sup>的优秀的中文秘书。有了这个极称职且认真的中国学者的帮助,我的考古工作就获得了极大的益处。在我们的那些考

① 参见《地理学刊》(*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911, 275 ~ 280 页。

② 我在这里能说明的是:我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探险之结果,已与我第三次中亚之旅(1913—1915)之制图结果一道,收录进了一部最终地图集之中。该地图集包括49幅图,比例为1:500 000,目前已在代赫拉·杜(Dehra Dun)的三角法测绘局中,已接近完成了。这一新地图集包括了我的中亚探险期间所做的全部地形学工作,并且是用改进的复制技术方法制作的。它还附有一篇《记》(*Mémoires*),是由我执笔的,内中详细介绍了使用的材料,包括三角图以及用天文学方法确定的各地点的全部名单。

在这一最终的出版地图中,我努力去校正出现的任何的不准确之处,这是由我们后来在现场对某些地点的制图过程中发现的;同时我还尽力去使当地名称的拼法与在代赫拉·杜制图时(1909—1911)保持一致。

由于与那个时期我不在英格兰,有关的技术上的原因,对我来讲已不可能为了地图集而去重新检阅那些原始绘图,或者去检查这些在最后处理阶段中的地图中的哪怕一幅校样,这个阶段正在处理山地以及不同种类的地面的颜色(耕地、带植被的沙地、流动沙丘等)。技术方面的其他原因,我在这里无法详细地进行介绍,总之它说明了某种工作上的粗糙。不过我还是相信,如果在现场进行验证的话,这些地图就其准确性之基本方面而言,是堪与先前绘制的任何中亚地形图相比较的。

③ 参见下文第三十三章第一节。

④ 关于蒋师爷的肖像见《沙漠契丹》,第一卷,插图39;第二卷,插图308。关于其相助我的例子,参见下文第十四章第四节,第十五章第三节,第十七章第三节,第十九章第七节,第二十一章第三节,第二十二章等。

古旅程和田野工作之中,他表现了最大限度的助人为乐品质,甚至准备着分担我的科学工作中的艰辛与劳苦。

蒋师爷的热诚和机智,在我与中国地方官的合作(这是实施我的探险计划之要素)中起了大作用。没有他们充分的帮助,我就不能够完成诸如运输、人员和给养等方面的工作,而这些对于在干旱的沙漠里或荒无人烟的山地里的探险是必需的。我常常怀着感激的心情记起,这个古老帝国的那些镇守在大沙漠绿洲中的官员们,他们一直在关照着,使这些绿洲变成了我的“行动基地”。我发现了很多值得信赖的朋友,他们对我搜集古代文物的目的和发现物,怀着一种真正的学术兴趣——这些都记录在我的个人探险记<sup>①</sup>之中了。但是,在此我要特别提到我的朋友和田按办潘大人(潘震),在我1900—1901年的探险中他给了我友善的帮助。当荣升为阿克苏道台之后,他亦未曾忘记利用他的高位所产生的影响来处处为我的考察铺平道路。

◁中国官员之助

自喀什噶尔出发时,我选择的是昆仑山(K'un-lun)山前地带,经莎车(Yarkand)前往和田(Khotan)(第三章第四、五节)。那年夏季快结束的时候,我到了南部的冰山,做完了那些尚未考察地区的测量工作,并且在和田这个古老的绿洲文化古都中,搜集了丰富的古物。之后,我又前往东北方的沙漠中,寻找到了一系列的、先前未涉足过的、风蚀的遗址,大有收获(第四章)。接下来是在东面的达玛沟(Domoko)一带被沙子湮没的遗址中的发掘,搜集到了大量的文物,还有一些梵文、和田文和汉文写卷,时代是在唐代末期以后(第五章)。最近对这个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那些垦殖地的系列变化的研究,带来了诸如“干化”问题一类的地理学研究课题。10月份下半月我在尼雅遗址(Niya Site,公元3世纪废弃在沙漠之中)重做的发掘收获颇丰,除了汉文文书和各种各样的反映早期塔里木盆地绿洲生活和文明状况的遗物之外,还意外地发掘出了一些用佉卢文(Kharosthi)和印度俗语(Prakrit)书写的木质简牍(第六章)。

◁在和田的考察, 1906年

之后我继续我的旅程,再向东到达了安迪尔河(Endere R.)尾间地带,这是我1900—1901年探察过的最远地区。在唐代城堡所做的新发掘,显示出了更早期的聚落遗迹,对揭示该沙漠遗址的历史带来了光明(第七章)。从安迪尔向东,我的漫长的沙漠之旅,经且末(Charchan)和瓦石峡(Vash-shahri)直至若羌(Charkhlik)(第八章),我搞清了这条重要的联系着和田和中原的古代要道的历史地理状况。从中可以看出,自玄奘(Hsüan-tsang)和马可·波罗(Marco Polo)以来,这条古道的地理状况实际上并未有多大的改变。

◁自安迪尔河到若羌

在若羌,我们到达了目前唯一有人居住的地方,它处在一个荒凉的由流沙、风蚀地和盐渍土构成的地区,在罗布淖尔(Lop-nör)的边缘,地形裸露,周围是塔里木河(Tarim)尾间的沼泽地,还有大面积的干枯的湖床。罗布泊地区即古代汉文中的楼兰(Lou-lan)或鄯善(Shan-shan),自前汉王朝以来,它在中国向中亚扩张的最早期路线上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楼兰古代遗存的探察,是我第一个冬季工作的首要目标。为此,对早期那些大量的有关罗布、鄯善和楼兰的历史记载做一个分析,显然是很有必要的(第九章)。

◁罗布地区的历史

我的直接目标,是位于罗布淖尔以北无水的荒原之上的古代聚落,它最早是由赫定(Hedin)博士发现的。这块风蚀地具有地理学和考古学的魅力。在向遗址进发的途中,从地表上可以见到大量的石器时代的遗物,还有明确的古代三角洲的痕迹(第十章)。在遗址区所作的系统发掘,现在可以明确地认定是楼兰的一处有墙的中国驿站,以及一处外围的较小的居址,此中出土了大量的汉文及佉卢文文书(其时代主要是公元3世纪)。此外还有很多属于那时期的建筑物遗迹及工艺品(第十一章,第一至九节)。我第三次旅行期间所做的补充考察,证明了“楼兰遗址”之所在,实乃中国进入塔里木盆地的最早路线(第十一章第十、十一节)。

◁考察楼兰遗址

在穿过塔里木河的尚未探察过的高大沙丘区并考察了尾间附近的一些小型遗址之后,我发掘了米兰(Miran)的废墟,此乃鄯善的一处早期聚落,位于罗布淖尔以南。在一座极度荒废的城堡中,我发掘出了数百件用吐蕃文书写的木简和纸文书,共出者尚有一些“如尼”突厥文(Turkish 'Runic')的文书残片,以及大量的其他种类遗物(第十二章)。这证明了遗址被占据的时代是在公元8—9世纪,然远较古老且明显地具有艺术价值者,当属某些佛寺之遗迹(第十三章)。其所装饰的优美壁画,连同佉卢文题记,极强烈地证明了自近东(Near East)移植入犍陀罗(Gandhara)的希腊艺术(Hellenistic art)的影响,即在中国境内亦曾开过花结过果。

◁在米兰遗址之发掘

1907年2—3月,穿过罗布荒原东北行,我循着当年马可·波罗及其以前的中国西行者的足迹,沿途既观察了那些将当今之塔里木盆地与疏勒河(Su-lo Ho)分隔开来的地带的自然地理状况,又考察了这条中国最早连接中亚之道路的历史地望(第十四章)。在抵达我在敦煌的新营地之前,我发现自己正受到上天的嘉奖——即发现了西汉武帝(Wu-ti)在公元前2世纪末叶为警戒其新开发的通往中亚的贸易和政治扩张路线、抵御匈奴人(Huns)的劫掠而修建的长城的极西部分。

◁通往敦煌之沙漠路

在本书第十五至十九章中,我记述了我在敦煌(Tun-huang)的为时两个半月多的调查。一方面是循古长城遗迹调查(这些城墙保存较好,其总长度超过140英里);另一方面则是寻找所有的那些烽燧和驿站遗迹,包括著名的玉门关(Jade Gate)遗迹。由于地处荒无人烟的戈壁荒原,尚未遭受到人为盗扰,我在这些遗址中发掘出了大量的用汉文书写的文书,它们主要是木简;此外还发掘出了很多生活用品,反映了公元前后时期这个荒凉的边境地区的生活。汉文文书之大部分,由于有沙畹先生所作的阐释<sup>②</sup>,使得研究变得大为便利起来,同时亦使我得以在本书第二十章中,根据这些亭障所提供的历史和文物方面的信息,对其一般组织之状况及文物意义来展开探讨。

◁对中国古长城之探察

然而,敦煌这地方还给我保留了另一个很具特色的大发现。在敦煌绿洲东南,在一座赤裸裸的沙丘覆盖着的山冈脚下,有一处名叫千佛洞(Ch'ien-fo-tung)的圣地。自公元4世纪以来,虔诚的佛教徒们在这里的石崖上凿出了数百座蜂窝状的洞窟。我在这里还发现了一些礼拜物(第二十一章)。洞窟中装饰有极大量的壁画和拉毛泥土做的塑像,其中有很多唐代的精美作品(第二十五章第一节),这些极珍贵的文物证明了像我这样一个来自西方的考古学者对它的朝觐是值得的。1907年5月,我非常幸运地成了第一位被允许进入一个隐藏在一座洞窟之中的藏有巨量的各种写卷、艺术品宝物的洞室之中的欧洲人,这些东西已隐藏了大约九百年。关于我在这个洞窟中如何获得那些古代写卷和艺术品的故事,在本书第二十二章中已有了详细的叙述。藏经洞的遗物中绝大部分都

◁在千佛洞之发现

① 参见《沙漠契丹》,第一卷,xvi页及各处。

② 参见沙畹《文书》(Documents),1~154页。



是写卷,其中大部分是汉文的,此外还有很多是用梵文(Sanskrit)、和田文(Khotanese)、龟兹文(Kuchean)、粟特文(Sogdian)、摩尼教的(Manichaean)和“如尼”突厥文、回鹘文(Uigur)及吐蕃文(Tibetan)书写的;另外还有一部分是绘画、刺绣、精美的织物以及其他艺术品贡献物。

所发现的古代佛教绘画

数百件精美的丝绸绘画(Paintings on silk, 亦包括绢画——译者),可以说揭开了佛教绘画艺术的新篇章。此种艺术形式是在中亚及中国地区发展起来的,同时又广泛地受到了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对它们的研究是由已故的彼得鲁奇先生(Petrucci)和宾勇先生(L. Binyon)合作完成的,他们的研究成果收录在本书的附录之中了(附录 E)。这些研究尚需延续下去。在第二十三章中,我只能尝试对所有的绘画遗物做一个系统的分类,并对它们的肖像画法和艺术效果之基本特征作一评论。现在我倒是希望,在第二十五章第二节中所提供的那些特别完整的描述加上本书第四卷和《千佛洞》(*Thousand Buddhas*)<sup>①</sup>一书中收录的代表作所提供的大量图版,将能促进资深的专家们对其做更深入的研究。

对织物的分析

在第二十四章第一至三节中所收录的大量且有趣的纺织遗物,关于其技术尤其是装饰图案,亦具有同样重要的分析价值。至于那些自藏经洞中获得的为数在数千件的各种语言的文书和写卷等遗物,第二十四章(第四至五节)仅记录了为对它们进行初步检查和分类所做的整理,以及快速地检查了一下其中任何具有准古物性质之迹象,诸如关于这个古老的寺院图书馆的来源等问题,我那些才华横溢的合作者们已做过的工作或许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资料。此处如同所有其他同类情况那样,对这些文献遗物之系统分析,并不属于本报告范围之内,它须留待其他资深专家的研究并在著作中去发表。

对发现物的研究

在南山及甘肃之考察

1907年6月,我从千佛洞出发,动身前往安西(An-hsi)绿洲。在那一带我调查了很多城墙(Limes)遗迹之后,接下来又探察了桥子(Ch'iao-tzu)之废墟,还有一小组以“万佛”著称的石窟寺,位于极西部南山的外侧山冈中(第二十六章)。之后在7月,我沿着这高大而荒芜的山脉一路到了嘉峪关(Chia-yü-kuan),此乃中国中世纪长城之西部门户,极著名。虽时代较晚近,然仍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在南山中部雪线地区,我做了广泛的测量,获得了丰富的地形资料。<sup>②</sup>在沿着通过甘、肃二州(Kan-chou and Su-chou)之古道上,我一路做了大量的古物搜集工作,这些都充斥着我在甘肃的全部工作(第二十七章)。之后又是秋季的长途跋涉,循着当年玄奘西行冒险穿过的北山(Pei-shan)的沙漠之路,随后又简短地访问了哈密(Hami)和吐鲁番(Turfan)的遗迹(第二十八章)。接下来是在焉耆(Kara-Shahr)的佛教遗迹中的发掘,收获颇丰,出土了丰富的希腊化佛教艺术风格的雕塑(第二十九章)。

塔里木盆地冬季之旅,1907年

我的第二个冬季塔里木盆地之旅,包括一次成功地穿越号称“沙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冒险,以走访了喀拉墩(Kara-dong)遗址而结束(第三十章)。此外,我随后又在和田以东、以北的沙漠遗址中,做了很多的发掘(第三十一章)。在1908年春天,我继续向北穿行,在麻扎塔格(Mazar-tagh)一座城堡废墟中,发掘出了大量的用和田文、吐蕃文及汉文书写的文书。从那里起,我路过阿克苏(Ak-su)和乌什(Uch-Turfan)以及天山南麓未测绘过的山地,踏勘了通往喀什噶尔的中国官道沿线的古迹(第三十二章)。最后,在返回和田之后我又利用尚余下的时间(这时已是1908年的夏秋季节了),在和田河水源与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之间的昆仑山中,做了一些地理学工作,该地区以前几乎不曾做过这方面的工作(第三十三章)。<sup>③</sup>这时,一个严重事件发生了——当我即将完成我的考察工作之际,我的脚部被冻伤了,我不得不返回印度去疗伤。然而至此我的搜集古物的工作已大功告成;大约一百余箱满载文物的箱子,到1909年1月底时,已被安全地运到了大英博物馆。

在昆仑山主要山区的调查

委派回英国,1909年

从此次探险中所带回来的庞大数量的考察结果,变成了压在我肩上的沉重担子。所以,当我自印度政府处获得一个特别任务,可以返回英国两年零三个月时间,为我对这些搜集品的整理工作创造了条件,我心中感到万分的高兴。已故的明陀勋爵(Lord Minto,后来的总督)出于其个人之谊,在征得国务大臣先生之允准一事上帮了大忙。由于所获新材料的详尽研究可能需要经年的努力,因此对我来讲,首要的事情是寻找一些专业合作者。

个人行记之出版

但是同等重要的还在于:我须得形成我自己的大致观点和结论,这对学者们抑或更广泛地对地理学工作感兴趣的公众都同样是有益的。在印度官方的热情允准及帮助下,到1911年末,我的个人旅行记《沙漠契丹》得以出版了。该书共两卷,有大量的插图,可以看作是一篇序言。从某些方面来看,又类似本报告之必要补充。

F. H. 安德鲁斯先生之助

我不能尝试在分配给我的在英国停留的时间内,去做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有关搜集品的整理和描述工作,尽管这是我个人的工作所需。我亦不能再次去烦扰我的那个富于经验及极具奉献精神的老友,他是一个艺术家,名叫弗雷德·H. 安德鲁斯(Fred H. Andrews),前拉合尔艺术学校校长,现任克什米尔工艺研究所所长。前此我曾多次重复介绍他对我所做的无法估价的服务。<sup>④</sup>他卓越的东方艺术和手工艺方面的知识,他对中亚文物的深入研究,以及他个人的艺术创作,都足以使他能胜任自我初次中亚探险以来的各种工作。我对安德鲁斯先生所付出的不倦努力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对我搜集的古物以及现在在这本报告的编写,他工作甚多,作出了重大牺牲。

大英博物馆的助手

最重要也最紧迫的工作,是按照遗址情况将诸出土物分类,编写一个完整的器物表。如果没有印度官方提供的便利以及几个训练有素的年轻考古学家——J. P. 德鲁普(J. P. Droop), F. M. G. 洛里默(F. M. G. Lorimer)小姐, G. L. 伍利(G. L. Woolley)先生;此外,起初一段时间还有 H. G. 埃韦林·怀特(H. G. Evelyn-White)先生,他连续充当我的助手有两年多时间——之助的话,我要完成这些是不可能的。在此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对洛里默小姐和伍利先生。后者凭借其在埃及所获得的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承担了对所有出土物名录的审阅工作。这些文物直至1911年底,当我返回印度复职时,他们尚在整理之中。

① 关于这个附加之出版物,见本页。

② 在《沙漠契丹》一书中有详尽叙述。见该书第二卷,297~333页。

③ 详见《沙漠契丹》,第二卷,440~482页。

④ 参见《古代和田》,第一卷,xi页等;《和田废墟》(*Ruins of Khotan*), xxiii页等;《沙漠契丹》,第一卷,xix页。

洛里默小姐继续其繁重的工作,她帮助大英博物馆在其北廊新开辟了一个临时性的展览,以向大众介绍我的全部搜集品的一部分。<sup>①</sup>对洛里默小姐我尤其感激她对我的帮助,因为此外她还整理了千佛洞中出土的绘画品的详尽名录。<sup>②</sup>同时自千佛洞、藏经洞中所得的纺织品遗物,大部分是由安德鲁斯先生负责整理的。

关于全部搜集品在印度政府与大英博物馆之间的分配问题,在此我想借便稍作解释。这些分配现已开始,<sup>③</sup>其无可辩驳的分配条件和理由,一开始就在《名录》(Descriptive Lists)中作了详细的说明。因为印度政府方面的五分之三份额将被陈列在新的德里帝国博物馆中,<sup>④</sup>所以要想在相距如此遥远的两个地方(伦敦与德里)中的各种文物间,为了研究目的而进行必要的比较的话,必须借助现在这份报告中的图录以及尽可能收录的图版。<sup>⑤</sup>鉴于《名录》之重要性,还应该特别提及的是:虽然经过了众人之手,我对那些我本人觉得尚需检查之处,还是做了严格的检查的。

上述工作的大部分,到1911年底我返回印度边省考古测量局复职时已经完成了。到那时,大部分器物插图已安排好,此外附录中所涉及的材料,亦已从合作者们那里得到了。《西域》(Serindia)一书之文字工作,花去了我1912年野外工作季节在犍陀罗遗址调查返回之后的大部分时间。直至1913年夏天,由于印度政府以及后来的总督哈丁勋爵(Lord Hardinge as Viceroy)的鼎力相助,使我得以开展我的第三次探险。这次探险产生了大量的考古学与地理学结果<sup>⑥</sup>,加上影响着这个遥远地区的、如同亚洲其他地区一样的政治状况的发展,证明这个长期渴望的计划之实施是很适时的。但是关于本书正文的准备,至1913年7月底我开始出发北上时方完成了四分之一。这次新探险持续到了1916年2月,延误了本书的完成。

幸运的是,这种耽搁得到了补偿。1914—1915年在罗布荒原及甘肃极西部地区所做的新考察,为解决那些大量的有关中国最早进入塔里木盆地之路线以及古代长城之东部范围等问题带来了曙光。从本书众多章节中的参考文献中可以看出,我对那些地区的历史学和地形学考察,曾自此新考察中获益匪浅。

1916年我的第三次探险结束之后,受印度政府的善意委派,我重返了英国。这段时间对我的剩余工作大有裨益。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我得以重新直接接触那些仍堆置在大英博物馆中的搜集品。这对写作于这个时期的《西域》一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很有益处(第十至二十章)。最后的但不是最小的一件事是:我须对返回英国一事感到高兴,因它使我获得了尊敬的奥斯汀·张伯伦先生(Mr. Austen Chamberlain)——他后来做了印度国务大臣——之大力支持。此外我感到高兴的是《西域》一书的很必须的补充文章的出版——我指的是《千佛洞》一书,其意在著录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绘画中之最具代表性者,以及不属于现下这篇报告范围之内者。<sup>⑦</sup>

1917年秋天,我返回克什米尔,被安排了一个特别职位。接下来我开始继续余下来的《西域》一书的编写工作,同时一边着手整理第三次探险所获得的遗物,还有就是准备编需要的中亚测绘图。我的正文手稿完成于1918年9月,在大约十个月以后,我很满意地看到它被投入了印刷。这部书曾经由我的第三次中亚探险以及战争状态所带来的艰难而延搁下来,现在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继续了下去。这浩繁巨著的完成非常得益于我的那段离开印度前往英国的日子,那时是1920年间,印度政府特意眷顾我,派我返回英国。

对我来讲,我在此尚须提及我对那些学者们的感激,他们给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且又很有价值的帮助,使我冗长的工作得以圆满结束。他们之中,我特别要感谢已故的爱德华·沙畹(Édouard Chavannes)先生,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西方汉学家,又是我最有利的帮助者。1909年春天,他已准备好对我发掘出的汉文文书进行深入研究并出版。尽管这些文书中有很多辨认和翻译起来难度太大,且又数量很多,但他本人所具备的快速而又深入的研究能力,使他在一年以后即对其中近千件文书做了诠释转译。这对我的《沙漠契丹》一书来讲,是一个及时的大帮助。该书由沙畹先生审阅,并提供了一篇清晰、精美的《导言》之后,以一卷独立的四开本形式出版,这为现下这部出版物提供了范本。<sup>⑧</sup>若细读《沙漠契丹》一书中有关出土了文书之古遗址的几乎每一章节,将会证明在什么程度上我对文书的过去所作的解释得到了沙畹先生的工作的指导,但是它们丝毫没有使他对我自他那里优先得到的帮助感到厌倦。

① 参见《斯坦因搜集品展》(Exhibition of Stein Collection)。

② 参见下文第二十三章第一节及《千佛洞所获绘画、木刻等名录》(List of Paintings, Wood-cuts, etc. Recovered from Ch'ien-fo-tung), 937~1088页。

③ 在《遗物索引》(Index of Objects)中,分配给大英博物馆者均标有“\*”号,见本书第三卷。这些文书中,所有的汉文、粟特文、突厥文及回鹘文文书,均陈列于大英博物馆之中;印度官方图书馆则接收了所有的吐蕃文文书。

④ 这不适用于那些已置于印度官方图书馆和伦敦的写卷的分配。

⑤ 关于《名录》中条目之整理,兹补注如下:条目整理是按照遗址点之编号顺序进行的,由于这些遗物在发现、获得或打开时须有顺序,故此种编号序列并不代表一种系统分类。所谓“遗址点”之编号,是按照发现时的遗址之词首字母、遗迹编号等,再加以阿拉伯数字而组成的,如N.XXIV.viii.35。此种情况下,后面之数字表示发现时的顺序。当我在遗址现场给定编号时,一般在白天的工作之后,我又在序号前加一个“0”,如L.A.VI.ii.061。我对这些遗物的仅根据出土地点之编号,在随后在大英博物馆中打开来时,在数字前又被冠以两个“0”,如M.I.ix.003。著录时为便利查阅起见,凡特殊遗物或特殊种类者前,均在遗址点前标以星号。如\*Ch.0010。在个别情况下,有部分涂抹过的“遗址点”在大英博物馆整理时被误读,为此我在处理特殊遗址时根据自己的现场记录做了必要的改正。在所有情况下,凡《名录》中之“遗址点”,均可被视作是最终检验过的。缩写之R.及L.用以指示著录遗物之右和左侧,用来专指遗物本身时则除外。

⑥ 关于此次探险之基本情况,参见拙作《第三次探险》(Third Journey),载《地理学刊》,1916,第四十八期,97~130页,193~225页。

⑦ 图录《千佛洞》包括48幅图版,大部分为24英寸×20英寸,其中约一半系真彩复制。该书获国务大臣批准,将在《西域》之后不久由伦敦Messrs.B.Quaritch出版,其图版注释可见本书第二十三至二十五章。

⑧ 参见《文书》。



## 沙畹先生之最后贡献

然而他自己亦有大量的属于自己的工作要做,他一度准备把那些与汉学研究有关的部分转让他人。参照附录 A 可以看出,他曾经凭其不知疲倦的双手,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贡献。自千佛洞中所得的有题记绘画,最后那些复写工作,本身即具有一种令人感伤的价值。<sup>①</sup> 这份工作是给那些遗物配上插图,他曾经建议在题铭研究院之《东方研究纪念文集》(*Mé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e*)中专门出版一卷,以纪念其已逝的学生及朋友彼得鲁奇先生。在写了那些信后不久,沙畹先生自己亦遭受了一场严重疾病的打击。三个月以后,他撒手人寰,对我们的研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我尚记得 1917 年 10 月的那个明媚的下午,我在返回印度的途中,在他那个位于玫瑰泉的花园家里向他道别,并承蒙他看顾,答应为拙作《西域》写一段献辞……此情此景,永志不忘。啊,我对他的高贵品质之回忆,将永不减退!

## 霍恩雷博士之助

我还遭受了失去另一位最有价值的合作者的打击,他是已故的 A. F. 鲁道夫·霍恩雷博士(Dr. A. F. Rudolf Hoernle),哲学领域里中亚研究的真正先驱。他曾尽其所能地帮助我的第一次探险计划,之后又精心地研究了那次探险的结果。他倾其同样杰出的能力,为我第二次探险携回的大量婆罗谜文献的分类、初步分析以及部分发表,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他的关于梵文、和田文和龟兹文文书的《细目》(*Inventory List*)一文(收录入附录 F 之中)证明了他虽年事已高,但对此种繁琐工作仍充满不倦的热情。在一系列文章中,他探讨了他对敦煌千佛洞藏经洞所得和田文文书研究之初步结果,随后他又将其中的一部分收入其著作《有关佛教文学之文书》(*MS.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中予以发表,该书部分得到了斯滕·科诺教授(Prof. Sten Konow)之助。<sup>②</sup> 命运垂顾这个已退休的学者,使他得以继续其繁重工作,直至其漫长而果实累累之生命的终点——那一天正是 1918 年 1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纪念日(11 月 11 日)。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帮助持续了过去的二十多年,他对我的永恒不变的友谊,将永远珍藏在我的心中。

## 佉卢文文书之合作研究

我对另外一些同样杰出的学者——E. J. 拉普森教授(E. J. Rapson),埃米尔·塞纳尔先生(Émile Senart)以及阿贝·博耶(Abbé Boyer)——一直非常满意,他们承担了我第一次探险中发现的佉卢文木质或皮质文书的解读和发表工作。<sup>③</sup> 他们还情愿涉难,来承担我第二次探险所获相关遗物的艰辛释读工作。拉普森教授直接辅助我编写了本书,他对尼雅和楼兰遗址出土的部分佉卢文木简做了有价值的注释。<sup>④</sup> 而与此同时,阿贝·博耶则更使我获益匪浅,他成功地释读了米兰和敦煌烽燧中所出土的一些重要的佉卢文及早期婆罗谜文书。<sup>⑤</sup> 至于我所发现的梵文文书,则得到了 L. D. 巴尼特博士(Dr. L. D. Barnett)及 L. 德·拉·瓦莱·普桑教授(Prof. L. De La Vallée Poussin)之极有助益的指导。

## 对吐蕃文文书之检索

我自敦煌千佛洞所携回的吐蕃文文书,现收藏在印度官方图书馆,原由该馆资深的图书管理员 F. W. 托马斯博士(Dr. F. W. Thomas)指导 C. M. 里德·丁小姐(Miss C. M. Rid Ding)开始着手分类编目;之后全由 L. 德·拉·瓦莱·普桑教授分类编目。鉴于里德·丁小姐与托马斯博士之雅意,我谨选其大作之精粹,收入本书之附录 I 中。对我的考古工作记录有直接且重要益处者,是对米兰和麻扎塔格城堡遗址所出土的吐蕃文文书(主要是一些准官方文件)编写一份详细、完整之目录,该工作由已故的摩拉维亚教派牧师 A. H. 弗兰克博士(Rev. Dr. A. H. Francke)来完成。<sup>⑥</sup> 我的这个资深的合作者牧师先生,还为那些著录发表了一篇一般性的有价值的注释——这亦收入了本书附录 G 之中。此外, L. D. 巴尼特博士还对千佛洞某些壁画上的吐蕃文题记做了精确的转译,此亦收录入本书之附录 K。

## 千佛洞汉文文书之编目

从敦煌千佛洞中携回的数千件汉文文书,现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中,其编目工作一直在循序渐进之中,由此方面的专家李约内·吉尔斯博士(Dr. Lionel Giles)以及 P. 伯希和教授(Prof. P. Pelliot)负责。两人一开始即承担此工作,然而在战争期间,由于军事义务及其他责任,此工作受到了影响。<sup>⑦</sup> 除了发表这些收藏品中的两件有趣的涉及敦煌历史及地理的汉文文书之外,吉尔斯博士尚答允帮我处理《西域》一书中所涉及的有关汉学方面的问题。

## 粟特文文书之合作

在伊朗文方面,我应该感谢我的朋友 A. E. 考利博士(Dr. A. E. Cowley),他现在是牛津博德利图书馆管理员(Bodley's Librarian, Oxford),他为释读一组用以前尚未知的笔迹书写的文书铺平了道路。后来这一工作由已故的 R. 戈蒂奥(R. Gauthiot)先生接续,其杰出的工作成就证实了此组文书中包括有最早期的粟特语文献。<sup>⑧</sup> 1916 年戈蒂奥先生为国捐躯,其猝然辞世延迟了这些文书的进一步释读,其亦未及亲睹我自千佛洞中所获晚期粟特文文书以这个杰出的学者的名义发表。晚期粟特文文书中的一部分,此前亦曾由 F. W. K. 穆勒教授(Prof. F. W. K. Müller)做过检索和考证。穆勒先生曾是自吐鲁番出土的此种语言文件的最早破译者。<sup>⑨</sup>

## 突厥学家之助

在突厥语方面, V. 汤姆森教授(Prof. V. Thomson)——著名的鄂尔浑(Orkhon)题铭的释读者——就米兰遗址及敦煌藏经洞所出土的古代文献,以及保存良好且完整的“如尼”突厥文写卷,帮我做了很好的编辑及说明工作。<sup>⑩</sup> A. 冯·勒柯克教授(A. Von Lecoq),大名鼎鼎的突厥学家和在新疆的考古发掘者,则负责我自敦煌发现的摩尼教写卷(Manichaean script)中的突厥《摩尼教徒忏悔词》

① 参见下文,附录 A,亦见第二十三章第一节。

② 参见《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 R. A. S.*), 1910, 834 ~ 838 页, 1283 ~ 1300 页; 1911, 201 页以下, 447 ~ 477 页;《有关佛教文学之文书》,第一卷, 21 页以下, 58 页以下, 75 页以下, 175 页, 214 ~ 356 页。霍恩雷博士尚准备了一些文字,等待在本书第二卷中出版。

③ 现已以《奥雷尔·斯坦因爵士在中国新疆所发现之佉卢文书》(*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为名出版,克拉伦登出版社,1920。

④ 参见下文,第六章第三节,第十一章第九节。

⑤ 参见下文,第十三章第八节,第十九章第五节。

⑥ 参见下文,第十二章第五节及第三十二章第一节。

⑦ 参见下文,第二十四章第四节。

⑧ 参见下文,第十八章第四节。

⑨ 千佛洞中所出粟特文文书,见下文第二十四章第五节。

⑩ 参见下文第十一章第八节,第二十四章第五节。

(*Khuastuanift*)的审定工作。<sup>①</sup>最后,我须在此感谢 E. 丹尼森·罗斯博士(Dr. E. Denison Ross),他现在已是爵士,我在同一遗址中所得之回鹘文佛教经卷的初步检索和细目工作是由他来完成的。<sup>②</sup>

在叙述完一长串我在语文学方面的合作者之后,接下来我想转而感谢那些对大量的艺术品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人们。这方面第一位助我工作的人,是我的老友 A. 富歇先生。我特别感谢他对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一些有意义的壁画所做的佛教造像学的正确阐释;<sup>③</sup>此外,他还就这些壁画的分类等,作了极有益的指导。<sup>④</sup>至于这些壁画艺术方面的问题,我则非常荣幸地得到了劳伦斯·宾勇先生(Mr. Laurence Binyon)的相助。宾勇先生是远东绘画艺术的权威,现在负责大英博物馆东方印刷及绘画品分部的工作。他的专业才干及关照,极大地帮助大英博物馆完成了对那些原先处于恶劣环境中的丝绸绘画品的成功保藏;而且他还相助完成了这些绘画在《千佛洞》一书中的图版复制工作。

◁佛教绘画方面的合作

正是出于宾勇先生之雅意,使我得以将我搜集品中的这个重要部分,找到一个无比杰出的合作者——他就是已故的拉斐尔·彼得鲁奇先生。对于他在 1911—1916 年间对自敦煌千佛洞所获绘画及其题记之研究中所付出的长时期的辛苦,在此我不可能去做一个全面的评述,也不必去这样做,因为诸君会从本书第二十三章有关千佛洞绘画部分中,读到详尽的内容。<sup>⑤</sup>

彼得鲁奇之英年早逝,是对他所涉及的诸研究领域的沉重打击,正如我在附录 E 中指出的那样,他原拟为那些绘画写一篇大部头的文章,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他在最后一次病前所著的两章,尽管细节上尚未全部完成,我亦把它们收录进附录 E 之中了。1917 年 2 月彼得鲁奇先生仙逝后,他的朋友沙畹、富歇及西尔文·烈维诸人出于友情,自愿承担了就“曼荼罗”(Mandala)之组成问题为出版社写一篇大型论文的工作。<sup>⑥</sup>这一工作还得到了 A. D. 怀利先生的关照,他负责有关供奉题记一章的写作。<sup>⑦</sup>毫无疑问,所有这些章节并不能代表作者们曾设想过的最后轮廓。有关佛教艺术的最后一位研究者,是劳伦斯·宾勇先生,他出于对其朋友的纪念,已同意用他自己的论文——《论敦煌绘画艺术》(*Essay on the Art of the Tun-huang Paintings*),来代替彼得鲁奇原计划中的结论一章。<sup>⑧</sup>

◁彼得鲁奇先生之助

关于其他种类的艺术品,很多学者亦为此贡献出了其各自的专业知识。已故的教授阿瑟·丘奇爵士(Sir Arthur Church, 皇家学会会员),对不同遗址中出土的拉毛泥塑和壁画所使用的材料,做了长时期的分析研究,其成果收录在附录 D 中。珀西·加德纳教授(Prof. Percy Gardner)曾凭其渊博的考古学知识,帮助我们鉴定了阴雕及印章等物。对 J. 史特拉兹高斯基教授(Prof. J. Strzykowski)来讲,在关于内陆亚洲古代艺术与近东希腊艺术之联系问题上,我则受其指教颇多,他亦非常客气地指点过敦煌千佛洞中发现的纺织品上的一些图案的临摹。施莱辛格小姐(Miss Schlesinger)具有乐器方面的专门知识,她为本书提供了一些建设性的注释(附录 H)。我对大英博物馆的李吉纳德·A. 史密斯先生(Reginald A. Smith)怀有深深的谢意,是他对罗布沙漠中发现的石器时代的工具做了详细鉴定。<sup>⑨</sup>我亦对 R. L. 霍布森(R. L. Hobson)先生表示感谢,他是中国瓷器的权威,对我考察所获陶器遗物给予了极有益的帮助。

◁其他类艺术品之合作

已故的 J. 冯·威斯纳教授,杰出的植物生理学家,他关于中亚造纸业发展之研究,是根据我第一次探险所发现的纸文书遗物来开展的。他对出土的早期粟特文书在显微镜下做了认真的分析。非常有趣的发现,是关于最早的破布制纸张的引进。<sup>⑩</sup>正是通过冯·威斯纳教授的善意引介,其高足兼工作助手 T. F. 哈诺塞克博士(Dr. T. F. Hanusek)对不同遗址所出的富有特征的标本,做了显微镜分析,其结论已被收录入“名录”之中,对于未来有关纺织史以及棉花种植业传播等的调查,具有不小的价值。然而令人哀痛的是,由于 L. 德·洛齐(L. de Lóczy)教授的谢世,再加上战争环境,在此已不可能介绍那些沙子及其他地质学标本之分析结果了。这些标本是由我采集的,那个卓越的中国最西部地区的地质学权威曾参与了其中一部分工作。正是洛齐教授第一次把我的注意力引入敦煌千佛洞艺术品之中,他在 1879 年访问了敦煌,在此我有足够的理由来述及我对他的由衷怀念。

◁对工业遗物等的分析

如果我在文章的最后才提及大英博物馆的两个特别有价值的合作者——J. 阿兰先生(Mr. J. Allan)和 T. A. 乔伊斯先生(Mr. T. A. Joyce),也仅仅是因为考虑到他们对遗物分类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上述两人为钱币名录做了精确的注释,此已收录入附录 B 之中;他们亦负责为图版 CXL 和 CXLI 的复制选定钱币标本。在此毋须对考古学家们指出,阿兰先生的注释对确定诸遗址之年代学序列具有多么重要的价值。在另一个领域,乔伊斯先生对我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相结合考察中所采集的人体骨骼标本,做了繁重的人体测量工作,在附录 C 中,收录了其大作《中国新疆及帕米尔地区体质人类学研究笺注》(*Notes on the Physical Anthropology of Chinese Turkestan and the Pamirs*)。在考古学和语言学两方面研究结果所显示的一致性,看起来正把我们引导向一个关于塔里木盆地人口的种族成分问题之中。

除了上述提到的大英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特别帮助之外,我还应当特别感谢该馆对我工作的积极推动。其馆长弗雷德里克·凯尼恩爵士(Sir Frederick Kenyon),他是巴士高级勋位爵士(K. C. B.); 相关的各部保管人, L. D. 巴尼特博士(Barnett), 悉尼·科尔文爵士

◁大英博物馆当局之助

① 参见《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11, 277~314 页, 922 页。  
 ② 参见下文第二十四章第六节。  
 ③ 参见下文第十三章第三节,第十三章第六节,第三十一章第二节。  
 ④ 参见下文第二十三章第一节。  
 ⑤ 参见下文第二十三章第一节。  
 ⑥ 参见下文附录 E, II。  
 ⑦ 参见下文附录 E, II、III。  
 ⑧ 参见附录 E, IV。  
 ⑨ 参见下文第十章第三节,第十二章第一节。  
 ⑩ 参见下文第十八章第四节。



(Sir Sidney Colvin), 赫尔克里士·里德(Sir Hercules Read)等,已尽其所能地为我提供了方便、周到的安排以及忠告。

我的探险结果之得以出版,实含有巨大而持久的努力在内。我在此应当向所有帮助过我、使我得以克服困难的人们,表达我诚挚的谢意,其中我尤其要感谢国务大臣阁下,由于他的惠允,使这部介绍田野工作结果的书的出版成为可能。而且,即使在经济情况发生大变化的1914年,尽管出版费用激增,而出书的计划仍坚持了下来。我始终没有机会向威廉·福斯特先生(Mr. William Foster)表达我的敬意,我一直仰赖其友谊及关照。他是印度官方档案馆主管,直接负责本书的出版。

《西域》之出版▷

当克拉伦登出版社的委员会同意承担本书的出版,以及所有图版(彩片除外)的准备工作之时,我感到很欣慰,尽管将会经常出现一连串错综复杂的技术难题;此外由于我和出版社之间相距遥远,也会带来很多问题。我对著名的《官方》(*Officina*)杂志资料之信赖,已受到过经验的全面验证,虽然前文提及的变化对它们施加了比能够预见到的远为巨大的压力。对已故的C.坎南先生(Mr. C. Cannan, 出版社委员会秘书)及其继任者R.W.查普曼(R.W. Chapman),我欠情太多。至于彩色图版,我须特别感谢班伯里的梅瑟斯亨利·斯通父子公司(Messrs. Henry Stone and Son, of Banbury),他们对选出的一些古代艺术品标本所做的三色过程复制,以及出版技艺和关照,使图片的制作获得了巨大成功。

但是关于《西域》一书的出版,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考古学家朋友J.德·M.约翰逊(J. de M. Johnson)先生。在1912年,他由于印度官方的安排,负责审阅和帮助校阅我的手稿。1918年在被任命为委员会助理秘书的情况下,他被迫将这份精细工作的大部分委托给了C.E.弗里曼先生(Mr. C. E. Freeman),但他本人仍一如既往地尽各种力量,以保证制图工作的精确和平稳进行。这儿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与出版社之间远隔重洋,对于1913年期间印刷的第一至七章,我曾经无法见到一章以上的校样;而1919年秋季时印刷的第八章情况亦如此。即使对那仅有的一章校样,我亦缺乏足够的时间;而工作条件——它们主要是在营地中完成的——亦不能使它做到完全的准确,这就解释了像在下文《补遗与勘误》中所频繁出现的错误的问题。

校样工作▷

自第八章开始,本书的印刷形式受到了C.E.弗里曼先生的殷勤关注,我要感谢他以其长期的文字经验所做的忠告,以及他对这件连我自己都感到万分辛苦的工作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而由于我在汉文名称和术语之转译(据《H.A.吉尔斯教授大辞典》[*Professor. H. A. Giles's Great Dictionary*]中所采用的韦德氏体系[Wade's system])中所确保的一致性以及在引用汉语参考文献时所确保的普遍的正确性,从而为我的汉学家资格增色不少。沙畹先生早在1913年即帮我做过此工作;随后的L.C.霍普金斯先生(Mr. L. C. Hopkins),杰出的汉学家,出于友情也介入了我的工作。他接替了沙畹先生的工作,既费时又劳心。对霍普金斯先生在汉文古文字学方面的特殊造诣以及助我释读某些古文古印,我早已经铭感于心了。L.吉尔斯博士帮我通读了有关中国亭障章节的校样;而西尔文·烈维教授——一部分由A.D.怀利先生相助——则帮助通读了我们已故的共同朋友沙畹和彼得鲁奇先生所著附录文章的校样。J.阿兰先生帮助审阅了本书有关非专门中国地区探险部分章节的校样,他的博大的东方学才识,使他做出了一系列的校正。由于其他紧迫工作之压力,使我自己来做索引工作已变得不实际起来,故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R.H.纽先生(Mr. R. H. New)被委托在我的一般性指导下,来负责此项麻烦工作。由于他付出的辛苦劳累,我在此深表谢意。

在结束记录在这部书中的漫长工作之时,我发现我正远离我心爱的大沙漠和山地。而我自年轻时即心仪已久的目的地——阿姆河之旅,依然前途未卜。然而,当我想起还有一项大工作伴随着我以及我的那些好友们对我的中亚探险所赋予的自始至终的至爱时,我充满了希望,也受到了鼓舞。正是在他们的庇护之下,这部关于过去发现之结果的书,才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奥雷尔·斯坦因



## 著作名称缩略表

- 比尔 《西域记》  
Beal *Si-yu-ki*  
《西域记,佛教徒对西方世界的记载》,塞缪尔·比尔译自玄奘《大唐西域记》(629年),两卷本,伦敦,特鲁布纳公司,1884。  
Si-yu-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of Hiuen Tsiang(A. D. 629). By Samuel Beal, in two volumes. London, Trübner & Co., 1884.
- 比达尔夫 《兴都库什》  
Biddulph *Hindoo Koosh*  
《兴都库什部族》,梅杰·J.比达尔夫著,加尔各答,政府印刷局主管办公室,1880。  
Tribes of the Hindoo Koosh, by Major J. Biddulph, B. S. C., Political Officer at Gilgit. Calcutta, 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 1880.
- 布雷特施奈德 《中世纪研究》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东亚中世纪研究——关于13—17世纪中亚、西亚地理及历史知识之断简残篇》,E.布雷特施奈德著,两卷本,伦敦,特鲁布纳公司,1888。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Fragments towards the knowledge of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from the 13th to the 17th century, &c. By E. Bretschneider. 2 vols. London, Trübner, 1888.
- 沙畹 《十题铭》  
Chavannes *Dix inscriptions*  
《Ch.-E.伯宁先生所获十件中亚汉文题铭》,巴黎,1902,重印自《法兰西题铭及美文学院学者纪念文集》第一辑第十一卷第二部分。  
Dix inscriptions chinoises de l'Asie centrale d'après les estampages de M. Ch.-E. Bonin. Paris, 1902. Reprinted from Mémoires présentés par divers savants à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I<sup>e</sup> série, tome xi, II<sup>e</sup> partie.
- 沙畹 《文书》  
Chavannes *Documents*  
《奥雷尔·斯坦因自中国新疆大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爱德华·沙畹转译并出版,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13。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Publiés et traduits par Édouard Chavann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3.
- 沙畹 《后汉书》  
Chavannes *Heou Han Chou*  
《〈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爱德华·沙畹著,《通报》,第二辑,第八卷,149~234页,雷顿,布里尔,1907。  
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Heou Han Chou, par Édouard Chavannes. 'T'oung-pao', série II, vol. viii, pp. 149 ~ 234. Leiden, Brill, 1907.
- 沙畹 《中国书籍》  
Chavannes *Les livres chinois*  
《纸发明前之中国书籍》,爱德华·沙畹著,《亚洲学刊摘要》1905年1—2月号,巴黎,国家印刷厂,1905。  
Les livres chinois avant l'invention du papier, par Édouard Chavannes. Extrait du Journal asiatique, numéro de janvier-février 1905.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05.
- 沙畹 《考古纪行》  
Chavannes *Mission archéologique*  
《北中国考古纪行》,爱德华·沙畹著,《图版》第一、二部分,1909。第一卷,第一部分,1913;第二部分,1915,巴黎,勒鲁。  
Édouard Chavannes.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Planches, parties I, II, 1909. Tome I, première partie, 1913; deuxième partie, 1915. Paris, Leroux.
- 沙畹 《附注》  
Chavannes *Notes additionnelles*  
《西突厥附注》,爱德华·沙畹著,《通报》,第二辑,第五卷,1~110页,雷顿,布里尔,1904。  
Notes additionnelles sur les Tou-kiue(Turcs) occidentaux. Par Édouard Chavannes. 'T'oung-pao', série II, vol. v, pp. 1 ~ 110. Leiden, Brill, 1904.
- 沙畹 《西域诸国》  
Chavannes *Pays d'Occident*  
《〈魏略〉所记西域诸国》,爱德华·沙畹著,《通报》第二辑,第六卷,521~571页,雷顿,布里尔,1905。  
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Wei lio, par Édouard Chavannes. 'T'oung-pao', série II, vol. vi, pp. 521 ~ 571. Leiden, Brill, 1905.

